

# 社会学名家讲坛

LECTURE SERIES OF EMINENT SOCIOLOGISTS

包智明 主编

- 杨善华 农村调查的得与思  
潘允康 论婚姻的社会性  
高丙中 海外民族志与世界性社会  
蔡禾 利益诉求与创新社会管理  
邱泽奇 中国人为谁而奋斗  
郭于华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关信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路径及当前的主要议题  
郭志刚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  
景军 社会理论在全球健康研究中的运用  
张庆燮 “压缩现代性”视野下的韩国社会

# 社會學名家讲坛

第三辑

包智明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名家讲坛(第三辑)/包智明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5462 - 5

I. ①社… II. ①包… III. ①社会学—文集 IV. ①C9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044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陈 晨  
责任印制 戴 宽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 言

《社会学名家讲坛》是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办的系列讲座之一。该系列讲座始于四年前。2010年，为纪念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之一就是举办了《社会学名家讲坛》纪念讲座。从2010年的3月至6月，我们邀请到十位国内外著名的社会学家来中央民族大学做学术讲座，这既是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也希望我校广大师生可以借机领略社会学名家的风采并分享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纪念讲座开始之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场场爆满，大受本校师生欢迎，而且来听讲座的还有不少从外校甚至从外地慕名而来的学子。一场讲座刚结束，就有很多人开始打听下一场讲座的时间。可以说，我们举办的这个纪念讲座获得了圆满成功。

十场纪念讲座结束之后，很多老师和学生来找我，希望能继续听到名家的讲座。为了满足广大师生的要求，我们决定把《社会学名家讲坛》的讲座继续办下去。这样，原本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纪念讲座，就变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常规性系列讲座。几年下来，我们发现，《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的效果明显，不但使听讲座的师生开阔了学术视野，而且也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学学科的认知度。不仅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坚定了学习和研究社会

学的信念，还有不少非社会学专业的学生受讲座感染，决定报考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或要求转专业到社会学专业学习，社会学成了中央民族大学的一个热门专业。

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专业还很年轻，但自 2001 年建立以来，发展迅猛，引人瞩目。这离不开包括《社会学名家讲坛》各位主讲人在内的社会学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也获益于老一代社会学家立下的深厚学术根基。众所周知，社会学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的优势学科。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借高等教育调整之机，汇集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全国一流人才，其中包括吴文藻、潘光旦、吴泽霖、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陈永龄、宋蜀华等国际级大师，完成了中国民族识别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形态调查等大型研究，为今天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奠定了综合多学科涵养、关注民族地区现实社会问题的学术传统。20 世纪 70 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重建之时，中央民族大学虽没有建立社会学专业，但老一代社会学家依然进行了社会学、人类学，尤其是民族社会学等相关内容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并在社会学恢复阶段的人才培养和学科体系建设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长于老一代社会学家培育的学术沃土，又有学界同仁的关爱支持，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才能在发展道路上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中央民族大学于 2001 年开始招收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2003 年开始招收民族社会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05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2011 年获得社会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12 年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在中国本科专业排名中进入前六名，社会学一级学科评估进入前十名；2014 年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一级学科被评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同年获批设立社会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学科有其研究方向的特色，即把社会学

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应用到中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之中，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做好国家民族工作献计献策。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面临改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建设和谐民族大家庭等议题。在国际和地区关系中，民族因素的影响作用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因此，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团队将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出发，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步伐的有利时机，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及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大局，充分发挥民族学科的资源优势，进一步提升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的特色与综合实力，构筑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基地，争取迈入国内乃至国际相关学科领域的先进行列。

如果说中央民族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在研究方向上体现了自己的特色，那么在教学方面我们更注重体现社会学学科的共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课程设置尤其力求与国内主流大学相同并与国际接轨。因此，主要面向社会学专业学生且与其教学相结合的《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其主讲人不局限于从事民族研究的社会学家，演讲内容也涵盖了社会学的各个研究领域（也包括归属社会学一级学科的人类学、人口学和民俗学的研究领域）。

应邀在《社会学名家讲坛》做讲座的主讲人都是国内外社会学界的著名学者，能够第一时间在现场聆听这些名师专家最新研究成果的人是幸运的。我们希望没有条件在现场听讲座的学子也能够共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征得各位主讲人的同意之后，决定把讲座录音整理成文字编辑出版。作为系列丛书，我们将按照系列讲座的先后顺序每十讲编辑成一辑陆续出版。收录于第三辑的即为系列讲座的第 21 讲至第 30 讲。《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的先后顺序完全是根据主讲人的时间方便来确定的，与其知名度和学术地位无关。

最后，借《社会学名家讲坛》第三辑出版之机，我向收录于第三辑讲座的各位主讲人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我也对参与第三辑

讲座的主持、现场翻译、录音整理、编辑、校对工作的中央民族大学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表示衷心感谢。在此我还要特别感谢袁剑博士为《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丛书出版所做的一切。

在提笔写此前言之际，惊悉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郑先生是《社会学名家讲坛》系列讲座第一讲的主讲人。以郑先生开头的这个系列讲座延续到了今天，他为系列讲座的启动和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谨以此书深切怀念郑杭生先生对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以及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包智明

2014年11月11日

# 目 录

(按讲座时间先后排序)

- |     |                               |               |
|-----|-------------------------------|---------------|
| 第一讲 | 农村调查的得与思                      | 杨善华 ( 1 )     |
| 第二讲 | 论婚姻的社会性                       | 潘允康 ( 30 )    |
| 第三讲 | 海外民族志与世界性社会                   | 高丙中 ( 52 )    |
| 第四讲 | 利益诉求与创新社会管理                   | 蔡 禾 ( 62 )    |
| 第五讲 | 中国人为谁而奋斗                      | 邱泽奇 (103)     |
| 第六讲 | 世界工厂的“中国特色”                   | 郭于华 (133)     |
| 第七讲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路径及<br>当前的主要议题 | 关信平 (149)     |
| 第八讲 | 中国的低生育率与老龄化                   | 郭志刚 (166)     |
| 第九讲 | 社会理论在全球健康研究中的运用               | 景 军 (201)     |
| 第十讲 | “压缩现代性”视野下的韩国社会               | [韩] 张庆燮 (225) |



## 第五讲

# 中国人为谁而奋斗\*

邱泽奇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人为谁而奋斗”，曾经，这个题目又叫“中国人为什么而奋斗”，其实含义是一样的。回顾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的发展变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现实中，我们除了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外，还要看看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到底有多大的变化。我们从人生最基本的价值观出发，来观察社会议题；在理论上，承接的是来自欧洲社会理论界非常关注、在美国还不大引起反应（美国一位人类学者很有感触，做了不少研究）的议题，那就是“个体化”。

今天的讲座，从美国人类学家阎云翔教授针对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讨论开始，提出问题。讨论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中国人在奋斗吗？在中国，有没有奋斗着的个体？第二个议题，如果有奋斗着的个体，这些人个体化了吗？有，还是没有？第三个议题，如果没有，他们为什么而奋斗？为谁奋斗呢？最后，做一个小结。

---

\* 主讲人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人为包智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与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该讲座的时间为2013年5月17日19:00—21:00。该讲座为系列讲座第二十五讲，由张学东录音整理。

## 一 “个体化”与“中国式个体化”

“个体化”概念，来自两个人的观点：一个人是贝克（Beck，1992），另一个人比贝克更早，是吉登斯（Giddens，1991）。

大家可能了解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研究，但不一定有那么熟悉；对吉登斯，大家要熟悉得多，他做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 Blare）的特别顾问，也是第三条道路的提出者。他对整体社会的观察，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我们知道的有“结构化”，不过，对“个体化”的讨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所谓个体化，就是贝克讲的“第二次现代性”，或“第二现代性”。

“第二次现代性”，有多层含义。第一层，指个体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对此，吉登斯认为，那是去传统化，或脱离传统，是在1991年提出来的；贝尔则称之为“脱嵌”。“嵌入性”概念最早来自波拉尼（K. Polanyi，1947），后来格兰诺维特（M. Granovetter，1985）将其发扬光大，在1985年以后，逐渐被大家接受，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讲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脱嵌”概念是2002年贝克和贝克葛斯寿（Beckand and Beck - Gernsheim）提出来的，其基本的含义是，个体不应该为家庭传承或血脉传承而奋斗。相反，家庭应该服务于个体的目标。对于社会而言，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从个体服务于家庭目标到个体独立，从对家庭的嵌入性脱离到家庭服务于个体目标，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在中国，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这个转变是颠覆性的，人生最基本的目标颠倒过来了。

第二层，指个体的自治。这是鲍曼（Bauman，2000）提出来的概念，指个体强制性的自治，或类似自己义务性的自治，自我的自治。换句话说，个体自治不是个体的主动要求，而是社会对个体能

力要求的一部分。这个概念，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这个概念，来自第一次现代性。在第一次现代性中，个体从家庭中脱离以后，开始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是社区性或群体性的自治，机构性的自治，类似于中国曾经存在的单位社会。第二次现代性的个体自治，是在制度上要求个体具有自治能力，在宪法或法律为个人提供保护的条件下个体必须自治。制度总是强制性的，所以称之为强制性的自我自治。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在中国，类似于将单位社会条件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转变为现代市场条件下个体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层，指个体生活方式的顺从性从众。也是贝克和贝克葛斯寿（Beckand and Beck - Gernsheim）2002年提出来的。指个体的生活方式，不是独树一帜，而是从大众习得，跟随大众，与大众为伍。

把这三个概念归纳在一块儿，对个体化就有了如下的全貌：第一，个体要为自己生活；第二，个体要依靠自己；第三，个体的生活方式，表现为顺从性的从众。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看阎云翔教授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研究。

阎云翔教授是一位人类学家，曾经在中国东北做过研究。他是北京人，曾经在东北插队很长时间，博士论文也是以插队的村子为素材写的。他出版了很多著作，包括《礼物的流动》、《中国人的私密关系》等，都有他插队村子的影子。

2010年和2011年，他发表的论著中，有相当的分量讨论的是中国社会个体化议题。其中一本著作就叫《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在这些讨论中，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图景，认为中国存在非常强烈、渴求成功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努力，会塑造一个个体化的中国道路，中国式的个体化。

中国式个体化，是相对于西方的个体化而言的。西方的个体化经历第一次现代性，也就是工业革命以后，个体与群体之间发生变

化；到第二次现代性，就是进入福利社会以后，个体的独立。阎云翔教授认为，在中国，很多人都在为成功而努力奋斗，有可能形成中国式的个体化道路。他认为，中国式个体化道路有自己的特征，包括个体化是在党国体制之下的个体化，而不是在现代体制之下。与欧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的个体化，缺乏欧洲个体化存在的三个必要条件：第一个必要条件叫文化的民主化；第二个必要条件叫福利国家；第三个必要条件叫经典个体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或者叫古典个体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三个条件，在中国都不存在，但个体奔向成功的努力，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正因为中国的个体化缺乏这三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个体化事实上携带着发展策略的特征，而这种发展策略，是在党国体制干预之下的策略。因此，中国个体化的过程，将可能包含着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的同时演进。

我的问题是，奋斗着的个体，真的会衍生出个体化的另一版本？

阎教授认为是可能的，中国会出现个体化的发展，只是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他认为，个体会从家庭、家族以及社会主义的工作单位中独立出来，这种独立会最终导致个体化的产生，这就是他所谓的中国式的个体化。

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这也是我做这项研究的一个诱因。

我的研究问题是这样的：个体的奋斗，会不会促进或带来个体化？其实，要回答这个问题，至少要先回答以下的问题：第一，在中国，真的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体吗？第二，如果真的存在奋斗着的个体，这种奋斗是不是导致个体的个体化，是不是因此形成个体化的中国模式？第三，如果不是导向个体化，那么，导向什么？

只有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们才能回答，奋斗着的个体是否会真的创造一种中国式的个体化。

这也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共同探讨的最主要的三个问题。

## 二 中国存在“奋斗着的个体”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奋斗着的个体，中国社会的个体，是不是在努力奋斗？

回答这个问题遇到的难题是，我们怎么测量奋斗着的个体？

有两种可能的数据来源。第一种，就是阎云翔教授采用的深度访谈方法。他2010年的那篇文章，数据来源就是用深度访谈方法获得的，列举了很多例子。除了他列举的例子，我们自己也能观察到很多例子，比如：在座的各位（学生）就是奋斗着的个体的一分子，“十年寒窗苦”，不管是工作着的，还是没有工作的，你的家长、同学在和你交流时，都会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会不会导致、会不会形成“真正奋斗着的个人”，我们不知道。

用深度访谈法获得的数据，只能告诉我们在访谈的人群中，是否存在奋斗着的个体；其实，深度访谈最能回答的问题是，人们在怎么奋斗。

如果要在一般意义上回答，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体，就需要做概率性的抽样调查。我们没有机会专门做这样的测量。不过，可以借用既有的抽样调查数据。

在我创立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的第一次调查——2010年的调查中，曾经有一组个体成功影响因素的访题，目的是测量社会针对成功影响因素的基本观点。人们怎么看待一个人的成功？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组访题，原题是这样子的：“下面列出了一些可能影响成功的因素，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些观点？”一共7道访题，将影响人成功的因素分为了3层级的因素：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为了避免访问效应，访题的顺序是随机安排的。

N5 下面列出了一些可能影响人成功的因素，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些观点？【出示卡片】

访员注意：

(1) 如果受访者表示“我不理解你说什么”、“不想回答”，选择6“不知道”。

(2) 访问时注意不要读出选项“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知道”，卡片上也不显示。

(3) 这道题不允许“CTRL + D”，“CTRL + R”，“79（不适用）”。

1. 十分不同意 2. 不同意 3. 同意 4. 十分同意 5. 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读出】 6. 不知道【不读出】

N501 社会地位高的家庭，子女的成就也会大；社会地位低的家庭，子女的成就也会小。（家庭社会地位对子女成就的影响。）

N502 富人家的子女，成就也会大；穷人家的子女，成就也会小。（家庭经济因素对子女成就的影响。）

N503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很大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大。（个体教育因素对个体成就的影响。）

N504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天赋。（外部因素，天赋是创造不了的，只能先天带来的；天赋性因素对个体成就的影响。）

N505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努力程度。（个体因素对个体成就的影响。）

N506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运气。（运气，就是机会，是社会带来的；社会因素对个体成就的影响。）

N507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或他/她的

家里有关系。(关系，是一个复杂所指，更明确的，是指由社会网络提供的机会。)

我们看看，从问卷调查中，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人们到底是怎么选择的，从“十分同意”到“十分不同意”的排序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结果，先看不同性别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这组访题，采用的是5分制计分，如果是完全同意就是5分，完全不同意就是1分。我们用平均分，对7道访题，依得分高低进行了排序。先看不区分性别的排序，是5、3、7、6、4、1、2。

再看区分性别的排序，我们看到，与不区分性别的排序的前三位排序，是一致的。我们看前三位，5是什么？是个体努力程度。3是什么？受教育程度。7是什么？家庭关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家庭的社会关系与家庭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是有关联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抽象表达，一个指标。中国有句俗语，“富在深山有远亲”，说的就是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

从结果上看，无论男女，都认为个体的努力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好像就是说，在中国，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体。

接下来，我们来看，具有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的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针对教育与社会经济地位（Education 对 SES）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说明，受过大学教育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之间有显著差异。从教育对人的观念影响来看，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此，我们把受教育程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读了大学的，一类是没有读大学的。

我们看看排序：5、3、7，与性别作为控制变量得到的排序是一致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不管是接受过大学教育，还是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大家都认为个体的努力很重要。



我们再看看不同收入群体的观念。收入是影响人们观念非常重要的外生变量。结果告诉我们，无论是哪个收入阶层的人群，其排序都是5、3、7。

不同年龄的人群，观念有差异吗？从结果中我们看到，不管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排序还是一样，还是5、3、7。

从这些已有的结果，我们看到，好像越来越接近于阎云翔教授的观察，在中国社会，的确存在着奋斗的个体。

我们再看，中国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人吗？通过加权得到一个比值，可以说中国社会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人，我们看到，有89%，将近90%认为，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人，持中间观点的只有3%，持不同观点的只有7%，绝大多数都认同。所以，我们通过概率数据的检验，证实了阎云翔教授的第一个观点，在中国社会，的确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人。

### 三 中国“奋斗着的个体”未实现“个体化”

我们接着讨论第二个问题，这些奋斗着的个体，会不会导致个体化？

大家还记得，前面关于个体化的约定：（1）个体要从家庭中独立出来；（2）个体要自治；（3）个体获得从众性的生活方式。

我们一步一步来看，在这些奋斗着的个体身上，是否能找到这些特征。

对上面的3个维度，没有现成的专门数据。我们用北京大学CFPS2010年和中国人民大学CGSS2010年的数据，从5个方面来做区分：第一，最基础的人际关系，也是传统社会最核心价值的关系——性别关系；第二，再看家庭的代际关系；第三，家庭的劳动分工；第四，个体与社区的关系；第五，个体与政府的关系。这些测量带有示意性，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具有系统性。



通过这些关系，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个体化的前两个维度，即独立性和自治。可以理解的是，如果没有独立性和自治，从众性的生活方式也无从获得。

我们先看两性关系，两性关系的测量，是很耗费脑力的问题，到底怎么测量两性关系。我们考虑到，同性恋是可以测量两性关系态度或观念的一个敏感指标。

我们来看看，这是从 CGSS2010 年的数据挖出来的，A40 你认为同性间的性行为对不对？

这道访题直指性关系，是最敏感的一个指标，就是看人们到底是坚守传统，还是倾向于更包容。这道访题的应答，有 5 个选项：总是不对（得 1 分），其它 3 个选项完全对（得 5 分），同样是李克特量表测量。我们对性别，用的是“Sex”，不是“Gender”，“Gender”是社会定义，“Sex”是生物定义。直接从生物定义出发，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四个控制变量，来看大家同意程度的差异。

同样是 5 分制测量，均值没有超过 2 分。没超过 2 分，意味大家不同意，标准差同样没有超过 1，即使 2 加 1 等于 3，3 表示中间，表示没有态度。最高值加上最大标准差，加起来也就是 2 点多，不到 3，大家是真的不同意。一句话，同性间的性行为，是不被认可的。

这说明，我们没从传统的性关系观念走出来，走向开放的、包容的性关系观念。

你自己采取怎样的态度，是一回事情；你自己干没干这样的事，又是一回事；你对这样的事容不容忍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大家对它不容忍。

我们再看，家庭的代际关系，这也是比较敏感的访题。你认为有子女的老人养老，应该主要由谁负责？应答选项，从政府开始，一直到老人自己，测量的是个体与不同层级的关联行动者之间的关

系。选项的顺序：第1是政府；第2是子女；第3是老人自己；第4是分担。对选项的测量采用4个分类变量，看到的是百分比。

占最大百分比的是子女，人们认为有子女的老人养老，应该由子女养。认为由政府养的，百分比也比较高，由老人自己养老的比例反而不高。从这里我们看到，人们还是把养老托付给了后代。要么托付给后代，要么托付给政府。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到，个体没有从代际关系中走出来，还是认同原有的、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

让我们再看，劳动分工，你是否同意以下的说法：（1）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女人应该以家庭为重；（2）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4）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应该先解聘女性员工；（5）夫妻应该均等分摊家务。

从（1）、（2）、（3）、（4）、（5）道题，我们挑了几道涉及家庭内部关系的题，我们挑选了（1）、（2）、（3）：（1）男人应该以事业为重，女人应该以家庭为重；（2）男性能力天生比女性强；（3）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从对这三个指标的统计结果来看，人们对这些表述，倾向于同意，性别之间的分工，还是倾向于传统。把3加上1也是4，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得分值已经快到5了，差不多接近非常同意了。从家庭内、外的比较来看，虽然家庭内部的分工倾向于性别平等；一般意义上的性别分工，还是遵从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

我们再看个体是不是在社区中具有自主观念和意识。我们选用了一道题，稍稍有些宽，不是太理想。不过，用于测量个体与社区之间关系的观念应该没有问题。我们用三道题来测量。（1）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2）像我这样的人很难对环境保护做什么。（3）除非大家都做，否则，我保护环境的努力就没有意义。

假设，环境保护议题，是社区性的议题，不管是组织性的社区，还是地域性的社区。如此，在保护环境的议题上，从个体与社区之

间的关系，就可以观察到个体的独立性或自主性。我们来看结果。就对环境关心而言，大家非常关注，以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年龄组作为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关注的程度接近于“非常关注”；可是，同样又非常同意，自己很难为环保做什么；还有，也非常同意，如果大家不做，自己做就没有意义。

从结果的表述我们发现，个体依然把自己努力的价值，建立在群体认可的、群体认同的基础上，的确没有从社区中独立出来。

我们再来看，个体与政府的关系。我们选的访题是：（1）如果某人在公共场合批评政府，政府应该制止他，你同意吗？（2）一个人生多少孩子，是他自己的事，政府不应该管。（3）个人在哪里工作，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应该管。

第一道访题，希望看到个体如何看待个体与政府的关系，如果用第二次现代性来看，你站在公共场合评判政府，可以吗？无所谓。如果不伤害他人，你自言自语，不影响他人，那无所谓的。从统计结果来看，人们认为应该制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倾向于制止。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大同意在公开场合批评政府。第二道访题，是从家庭的视角看个体与政府的关系，从统计结果来看，大家认为生孩子是社会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第三道访题，纯粹从个人的视角来看，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工作是自己的事，不是政府的事，也就是说，在工作问题上个体有自主意识；但在涉及真正的自我问题时，又和国家绑在一起。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知道了个体没有从传统界定的两性关系中走出来，没有从传统界定的代际关系中走出来，没有从社会界定的性别关系中走出来，没有从传统界定的家庭劳动关系中走出来，也没有从传统界定的与社区、与政府的关系中独立出来。一句话，我们在这里看不到第二次现代性所界定的个体。

到目前为止，我们证明了，在中国社会的确存在着奋斗着的个

体，只是这些个体并没有第二次现代性的任何特征，都还处在传统状态，没有个体化。

#### 四 中国“奋斗着的个体”为家庭而奋斗

第一个问题，我们回答了，在中国，的确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体。

第二个问题，我们也回答了，这些奋斗着的个体，不是在为个体而奋斗。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而奋斗？为谁奋斗？这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再看，用 CFPS2010 年的数据，M5 这道题。这道题测量的是人生终极价值观，问人一辈子到底为什么而活着？为谁活着？

这道题问，人的一辈子，下面的这些事儿，对您的重要程度如何？（1）很有钱；（2）不被人讨厌；（3）生活有乐趣；（4）与配偶关系亲密；（5）不孤单；（6）有成就感；（7）死后有人想念；（8）家庭的美满和睦；（9）传宗接代；（10）子女有出息。

这个指标组希望测量的是，从个体到配偶、到家庭、到家族、到子女的一个序列。问题的顺序，是有意打乱过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测量中的误差。

其中涉及个体层次价值的议题为：（1）很有钱；（2）不被人讨厌；（3）生活有乐趣；（5）不孤单；（6）有成就感；（7）死后有人想念。

涉及配偶层次价值的议题为：（4）与配偶关系亲密。

涉及家庭层次价值的议题为：（8）家庭的美满和睦。

涉及家族层次价值的议题为：（9）传宗接代。

涉及子女层次价值的议题为：（10）子女有出息。

如果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家庭，子女有出息、与配偶关系亲密，也属于家庭层次的价值。

如此，我们就将整个指标组分为了三个层次：个体、家庭、家族。

我们先看以性别为控制变量的结果，同样采用五分计分制，排在前三位的是（8）、（10）、（4）。（4）是与配偶关系亲密；（10）是子女有出息；（8）是家庭美满和睦。从统计结果来看，无论是区分男女，还是不区分男女，排序都是（8）、（10）、（4）。

我们看以受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的结果，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只区分了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在不区分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条件下，排序是（8）、（10）、（4）。注意，如果以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作为控制变量，排序有变化了，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排序依然是（8）、（10）、（4）；可是，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排序，变成了（8）、（4）、（3），（10）到了第四位。（3）是生活有乐趣，有一项个体性的指标排在了家庭性的指标之前。同样需要注意的是，（8）始终还是在第一位。

接着我们看以收入组作为控制变量的结果，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只区分了高、中、低三个收入组，并用地区差异进行了矫正。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区分收入组，前三位的排序还是（8）、（10）、（4）。不过，有些变化，非常值得研究，譬如低收入组中，（9）传宗接代就排在第四位，（3）生活有乐趣则排在第五位。

再来看看以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的结果，在这个分析中，我们只区分了老、中、青三个年龄组，结果有些变化。不区分年龄组的排序结果依然是（8）、（10）、（4）；如果以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我们看到，中年组的，与总体一致，依然是（8）、（10）、（4）。老龄组的，前两位排序一样，为（8）、（10），第三位却变了，为（9）传宗接代。青年组呢，也变了，为（3）生活有乐趣。

尽管在以受教育程度、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排序第三位指标的变化，但是，家庭美满和睦、子女有出息，是所有10岁以上人群都认同的人生目标。

为了校验这个分析结果，我们用 CFPS2010 年调查中的 N505 “影响一个人成就大小最重要的因素是他/她的努力程度”作为控制变量，做 logistic 模式，二分变量的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最大的 Beta 值，还是家庭美满和睦，大家可以看 Beta 值的变化，其次是子女有出息。

同样用 N5 作为控制变量，排在前三位的仍然是（8）、（10）、（4）。

到这里，我们可以确证，在中国，的确存在奋斗着的个体，可是人们并不是在为自己而奋斗，这样的奋斗没有，至少暂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人们在为家庭美满和睦而奋斗、为子女有出息而奋斗。

这就是中国社会目前最重要的社会特征。

从这个特征出发，我们可以解释很多过去无法解释的社会现象，例如瓮安事件、各地的强拆事件，凡是对家庭的存在构成威胁的，都会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 五 小结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奋斗着的个体。看看我们身边的人，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奋斗，这是欧洲人难以比拟的，也是美国人难以比拟的。

不过，如此奋斗，不是在为着个体，而是在为着家庭。从分析中我们发现，我们的奋斗并没有从政府管制中脱离出来，也没有从非地域性社区脱离出来，更没有从传统的价值观念中脱离出来，我们唯一有的是个体化的家庭观念，就是融入个体血液的家庭观念。尽管这个观念在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年龄组方面有些小的差异性。

为家庭美满和睦而奋斗，把我们带到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讨论，

他认为“差序格局”、“礼治秩序”，是中国社会传统的两大特征。把这两者综合起来看，无论是差序格局，还是礼治秩序，实际上，都是基于家庭秩序的。费先生在讨论差序格局时，是从个体出发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在中国社会，其实不存在自私的自我，存在的是家庭中的自我。如此，对中国社会特征的分析，是不是可以将分析单位从费孝通先生当初用个体作为起点讨论差序格局再往前推一点，提高一个层级，到家庭这个层级上来呢？

不管我们是不是期待中国社会走向个体化社会，都绝不意味着是一个没有亲情、没有家庭观念的社会！或许有人会说，西方社会人们也在为家庭、为孩子奋斗呢！

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是一个有本质区别的问题。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一个在个体自治、自主基础上，基于个体责任，为了后代，为了子女，这样一个家庭，与一个基于群体规则为了后代的家庭，是两个概念，是两回事。

举一个例子，在西方社会中，比如收养，两个同性恋者，可以收养一个孩子，在美国是合法的。在中国，至少在现在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我们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家庭，到底哪个好哪个坏，说不上，需要加之时日来观察，到底哪一种有利于社会团结。一个社会没有纽带、没有凝聚力，社会就毫无意义。

社会学需要贡献的是，为社会的凝聚力和纽带找到重要的影响因素，来影响社会政策和社会思维。

这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中国人为谁而奋斗”。

## 提问环节

### 同学提问 1：

如果社会存在奋斗着的个人，那么对于社会而言，是不是存在别的问题，这样奋斗着的个人，在我们社会有多大比例，这样的比例会反映或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吗？



邱泽奇教授：

我非常抱歉，我不能马上给你一个比例，未来研究，需要一个比例。

今天，我用认知测量替代客观测量，是因为当你要测量实实在在奋斗着的个人的时候，需要有关于奋斗本身的测量。我今天报告的是主观认知，为什么主观认知可以告诉我们存在着这样奋斗的个体？在测量中，这是一个技巧问题。当没有客观指标去测量，或没有办法测量客观事实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是用“知、信、行”逻辑——你知道、同意，就会做。至于这个逻辑对不对，“陶行知”的名字，已经告诉大家，这是长久争议的问题，不过，目前仍然是一套可用的逻辑。我希望未来的调查中，我们能做一点工作，为大家提供一些数据。比如说到底怎么奋斗，是不是用工作时间、工作的努力程度可以测量的，一是时间，二是精力。时间好测量，精力难测量。这是未来数据收集中，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内容。

同学追问1：

如果存在一个比例的话，会不会影响社会公平？也就是，这样的个体是不是为自己，没有为社会？

邱泽奇教授：

我倒没有听明白，努力着的个人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要我说，这是两回事，努力的个人意味着努力工作，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这叫奋斗着的个人，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工作。我们刚刚的论证就是想说明，在中国为自己奋斗的个体，还没有占主流。

为自己工作，还是为家庭努力，社会道德准则，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到底为个人自私还是为家庭自私。为个人自私，可以不顾家庭，为家庭自私，也可以不顾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有“裸官”、“裸商”，他一个人在这里，即使他有一百个二奶，家还是他的家，他还是把自己的努力成果贡献给他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把孩子送出去，把老婆送出去，而不是把二奶送出去。奋斗着的个体，就是每



个人都在努力工作，努力奋斗，在座的每个同学，都在努力奋斗，努力学习，这是一个描述。另外一个描述，这种奋斗不是为了个人的娱乐和个人的幸福，而是为了家庭和睦美满。

这样的描述，与社会公平之间，还有比较远的距离。

**包智明教授：**

我提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学者在做研究时，总是按照自己界定的操作定义去测量社会现象，包括对研究对象主观认知的测量。比如，有没有奋斗着的个人？大家也看到，在邱老师的研究中，也有这种主观认知的测量。从研究对象的主观认知来看现象的时候，即你的研究对象认同的“奋斗”，与我们作为研究者或从理论出发界定的“奋斗”是有差别的。对于定量研究者来说，如何把其核心概念的操作化与其研究对象的主观认知之间连接起来，是关联到一项社会测量成败的关键所在。就此问题，请邱老师解答。

**邱泽奇教授：**

包老师的问题，是非常切中要害，非常有见地的问题。

我们以上述例子，看看中国人是不是很努力，测量的结果，有可能是自我粉饰，自己说自己好，问题在哪里呢？如果是小样本，这种自我粉饰能够导致很大的偏差；如果是大样本，自我粉饰就构成了系统性误差。

换句话说，如果样本足够大，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在说谎，所有人都倾向于自我粉饰。即使如此，也是有意义的信息。有个社会调查专家库珀（M. Couper）讲过，对调查者而言，任何的只言片语，都是信息，任何的反馈，都是信息。我们假定所有人都在撒谎，都在自我粉饰，同样是反馈的信息。据此，我们可以推论，即使他没有认真努力工作，他也认同认真努力工作是他努力的方向。同样，这是我们大家正向认同的价值观和正向认同的观念，而不是负向认同的观念。

刚才，包老师和同学提的问题，都很好，如果我们的测量，既有主观测量，又有客观测量，就更好。其实，CFPS中有工作时间测量，作为一个参数，可以交互印证。帮助我们确认，到底是自我粉饰的认知，还是有事实依据的认知。这样，就能有证据确证，到底是意识中的奋斗着的个人，还是实践中的奋斗着的个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同学提问 2：**

关于“同性恋”那个题目。在CGSS调查中，也有“婚前性行为”访题。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不用“婚前性行为”访题？第二个问题是，“同性恋”访题的结果，在城市和农村会不会有差别，不同年龄阶段会不会有差别？第三个问题是，对同性恋问题，我听过很多版本，比如说，在农村，年纪大一些的人，会说不知道什么是同性恋，我们的学生解释说，两个男的关系比较好，他还是不理解，说我和我们村的人关系都很好；学生又换一种说法，两个男的谈恋爱，两个女的谈恋爱，他还是不理解，最后，实在是没办法。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待？

**邱泽奇教授：**

这是三个非常有水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怎么做测量就是什么样的测量，是一个有效的测量。同学们在做论文时，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人们总是想尽可能把一个测量序列做周全，想法很好，不过，每一道访题的背后都是资源，每一道访题都要耗费成本。

当多道访题都可以测量同一个概念的时候，就需要做选择，常常是选择最有效的访题。我在研究中用的这道题，与“婚前性行为”访题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可不可以做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同意同性性行为的人，更同意婚前性行为；不同意同性性行为的人，会对婚前性行为持保留态度。这个命题，可不可以得到检验？直觉上是可以得到检验的，如果有数据检验更好。

需要检验的是什么呢？是人们对两性性关系的认知到底是局限于传统社会的观念，还是有了突破和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因此，这道题实际是用了测量中的两个极端测量，就是0到100的测量，同样，我们用了0到5，也是两个极端，我把这个问题搁到左边的极端上，与其用中间值来测量，不如用极端值来测量，可以给一个充分的变异。要是拿中间值来测量，得到的变异性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用“同性恋”访题，而没有用“婚前性行为”访题，两个问题是同构的。同性恋访题，在一定意义上，包含了婚前性行为访题。

第二个问题，问城乡差别。城乡一定有差别，为什么不做区分？涉及测量的精度。在社会研究中，对测量有一个误区，认为测量越精确越好。我认为，测量适中最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受教育程度，你们通常怎么问受教育程度？问学习阶段，对不对？如果是我，我会马上问，拿受教育程度做什么用？测量一定要有用途的，如果是用来测量教育投入的，用受教育阶段测量，是达不到测量目的的。假定你的成绩很差，假定有的老师教得很糟糕，每年有一半学生留级；假定有的老师教得很好，有一半同学跳级。你就发现，你测量不到家庭教育投入、国家教育投入、社会教育投入。如果要用于教育投入的研究，通常要问的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接受了多少年的教育，“年”是个投入时间单位。教育投入都与时间有关，因此，问教育阶段是达不到目的的。

不考察城乡差别，不意味着没有城乡差别，而是这里我无须测量城乡差别，我只希望看总体趋势。当然，如果你有兴趣，可以接着做。只是我的测量精度，不要求或不期望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因此，区不区分、怎么区分，和研究目标关联着的测量精度绝不是越精越好。

第三个问题，是调查提问的技巧。农村老大爷，的确很难告诉他什么叫同性恋。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提问技巧。如果我是访员，

在进村之前，我会了解一下，在当地如果两个男人干什么勾当，当地人叫什么。当地一定有一套术语来表述这种行为，各地都有各地的土话，每个地方都有本地文化和术语，同样一件事情，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叫法，在做调查之前你得问清楚。这是调查中的事儿，不是小事儿，也是争议很大的事儿，到底是照本宣科地读原文，还是转换为当地的术语提问，争议挺大，没有一致的结论。

这里，我还是倾向于运用地方性术语提问，这样才能达到调查目的。

### 同学提问 3：

我问一个关于结论的问题，如果说西方的个体化，是为了个人幸福的个体化、个人主义的个体化，那么，就中国的情形而言，以家庭美满和睦为目标的个人奋斗，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什么？比如说，个人在北京奋斗，他的家庭植根于北京，如果单位或企业选择离开北京，去其他地方，我想很多人都会辞去这个工作，留在北京。这究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问题，以家庭美满为基础的个人奋斗，是一种个人主义倾向还是个体化，还是以家庭为基础的中国传统主义，到底是什么？

### 邱泽奇教授：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难回答，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以家庭美满和睦为目标的个体奋斗，到底会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费孝通先生讲的“自私”，在差序格局中、在中西比较中，他讲的“自私”，是个体的“自私”、个人的“自私”，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以家庭美满和睦为目标的自私。它是不是与为了个人的自私有同样的危害性，我觉得现在很难评估，这需要数据证明，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议题，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问到的是，奋斗着的个体为了家庭美满和睦会不会走向个体主义，会不会走向西方意义上的个体化，跟个体主义又有什么区别。这里我要特别说明的是 Individualism 和 Individualiza-

tion 是两个概念，个体主义和个体化是两个概念，个体主义是讲个体置于群体的意义，叫个体主义。个体化讲的是，个体的独立，个体的特征。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个体化，个体具备的特征。这两个概念，常常会引起混淆，我相信，他提这个问题是经过思考的，对其他同学也具有启发性，谢谢！

**同学提问 4：**

非常感谢老师的讲座，我们刚才看到，老师给出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奋斗，主要是为了家庭的幸福还有子女的成就，奋斗着的个体的个体化，还不是很明显，但是，有个体化的倾向，我们期待有个未来。我想问的问题是，在这个发展的未来，子女成就现在排在第二，这样的排名，当个体化进一步发展的时候，会不会靠后？子女成就对奋斗着的个体究竟有什么意义？子女成就跟父母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对父母有什么利益？我想知道有什么样的实际意义，然后，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有没有区别？

**邱泽奇教授：**

我觉得后面的问题提得非常好。

在座的绝大多数是子女，你们特别不明白，到底你们父母为了什么，是不是？

我大概做一下解释，最后一个问题我先回答。父母一不为钱，二不为回报。现在，大多数父母只有一个子女，到你们，一对夫妻要养四个老人，甚至五个老人、六个老人、七个老人，最多可能八个老人，子女的负担极重，子女根本不可能养得过来。

这时候，父母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了子女？

这个问题，我前面讲过。美国人为了家庭和中国人为家庭有什么不同？

我的观点是，一个是自觉为了家庭，个体化的后代；一个是，还把后代作为价值观的传承者来对待。换句话说，一个是社会的子女，一个是家庭的子女。美国人、欧洲人养育的是社会的子女，中

国人养育的是“我的孩子”，家庭的子女。

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你能听明白不？

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区别就是，个体在社会中的标志性意义。

如果一个个体，一对父母是为下一代，为了社会的下一代，而不是为了家庭的下一代，就是测量个体化非常重要的指标，前面讲的家庭为个人服务。但，如果反过来，子女属于家庭，就是属于自己，那是为家庭服务。

为什么为家庭服务？现在又不能给我养老，又不能给我干这个、干那个，我为什么要为家庭。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带到与父母的互动中去，父母希望传承给你的，是一个价值观，为你做这个、做那个，他们要传承给你的没有别的，是一个空洞的价值观，是一个不带钱的价值观，他们要告诉你，你要怎么对待你的子女，仅此而已。

这就是扎根中国社会最传统的价值体系。香火的传承，是一个形式化的传承，价值传承，是一个本质的传承。

我再回答第一个问题，个体的努力是为了家庭美满和睦，没有幸福，美满和睦是一个状态，前面强调过了，不是感受，状态和感受在测量时是两回事。要表达的是，给其他人看的状态，美满和睦不是给自己看的，是给社会看的。幸福是给自己享的，幸不幸福是你自己感觉得到的。但是美满和睦是给社会看的，这个差别，具有社会意义。

在社会的意义上，如果每个家庭都是美满和睦的，这个社会就应该是美满和睦的；家庭存在纷争，家庭之间就会为了家庭内部的美满和睦而相互纷争。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价值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归家庭，不管别的，这样社会也就乱套了。危险，就在这里。为什么我在这里提中国的裸官，裸官就是不顾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他把贪污所得、把不义之财拿来养他自己的家，不顾社会基本秩序了，这就是大家对裸官痛恨的原因，因为他损害到其他家庭。



我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稍后再讨论。

**同学提问 5：**

我问的问题是，中国以家庭为主的价值观念。为什么我们天生就知道家庭的重要？肯定之前有人论述过，但我没有读过这些书籍，请老师解答一下。还有，西方人他们是怎么认识的，比如说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制度，比如说中国在市场化、在改革开放后，制度性的东西，比如保障制度，养老模式的改变，制度是不是对这种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再有一个问题，个体奋斗是为了家庭，个体奋斗会不会导致个体主义，个体奋斗跟以前不一样，个体通过工作来获得价值，在工作中得到乐趣是可能的，个体奋斗会对价值观产生影响。

**邱泽奇教授：**

一是中国人为什么生下来就为家？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你，真的很难回答你。我今天给大家陈述的是关联关系，不是因果关系。我真不知道，中国人为了家的观念，是从何而来的？有些人，比如余秋雨，可能会说是从儒家开始就有的观念，比如说，他会给你举个例子，孟母三迁。前不久在重庆，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母亲为了他搬了七次家，这些行为是怎么来的，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在文化研究中，有个基本概念，文化是一个意义符号体系，文化传承是一种从众，至于说怎么来的，是很难说的事。

第二个，你问到奋斗着的个人会不会导致个体主义，刚才我已经回答。我试图区分两个概念，奋斗着的个人，不排除他是个体主义的，丝毫不排除这一点，个体不顾群体，但绝不意味着不顾群体的个体也会不顾家庭。

如果我们把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家庭与社会之间是有张力的。每个家庭，都为了自己家庭的时候，家庭之间的张力就会非常大，影响到社会。个体主义的分析单位，就会从个体上升到家庭。

费孝通先生讲“差序格局”和“礼仪秩序”的时候，讲到一个议题，他没有排除说，个体奋斗会导致个体主义，会影响什么，这

不是我的议题。我在讨论中，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我建议你看一下李泽厚和刘再华的讨论，关于中国社会的个体主义，大家在 CNKI 上就能查到，我觉得那个讨论还是蛮有见地的。

第三，你问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状态，市场经济会不会影响人们为了个人而个人。我觉得很难做预测。你们这一代人所发挥的社会效益，还没有反映出来，要等到 80 后、90 后这拨人走向社会舞台，才会发现社会的变化、社会的影响到底在哪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还是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自己的观察。观念的变化，常常是在代际之间发生的，代内很难发生改变。从概率上讲，比如说，包老师观念很开放，是他个人，不是一代人。包老师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受“文革”的影响非常深，这个烙印是抹不去的，已经融在我们的血液中和价值观念之中了。你们是否会有他们的价值观，只有你们登上了可以表演的舞台时，才能观察到，现在真的很难观察得到。谢谢你的问题。

#### 同学提问 6：

您讲的其中一个访题，是在公共场合批评政府，数据显示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越同意批评政府。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个体化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以及在不同社会形态中比如中国社会和其他社会政府扮演角色的差异，就是说，在个体化过程中，政府的角色以及不同社会形态中这种角色的差异。

#### 邱泽奇教授：

我好像记得，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反而更同意在公共场合不批评政府，这个问题是需要关联性检验才能做解释的。我的基本假定是，他们更理解在公共场合批评政府产生的后果。所以，不主张这样子。也许他们认为，如果有更好的建议，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而不是通过街头方式来表达。这也是世界各国都主张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主张；你可以写提案，你可以写议案，还有，你可以去游



说。目前，只能做推测，没有数据证明。

后面的问题是，政府在个体化中扮演角色，这个很难讲，我觉得个体化极有可能像我和包老师，我们无论如何都个体化不了，你们90后会走向为了个人而奋斗，我觉得很难说。政府能做的，是通过环境影响个体，而不是直接影响个体。

**同学追问6：**

或者变一下问，就是说，政府愿不愿意看到个体化。

**邱泽奇教授：**

这个很难说，这要问习近平主席。估计，他也很难回答。

**同学提问7：**

老师，您好，如果说我们达成一个共识，社会确实在走向个体化，那么，是社会所有成员同时走向个体化，还是一部分人比如说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青年人走在前列，走向个体化？

**邱泽奇教授：**

一定会有差异。对做实证研究的人来说，要看数据。今天讲的内容，还不涉及这个问题。

**同学追问7：**

那，老师，比如说同性恋这道访题，更多年龄比较大的人，思想比较陈旧，比较传统，他们不认同同性恋。您调查的数据，是10岁到80多岁，其实十几岁的孩子，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更多受家长的影响。很多青年人对同性恋，就持认同态度。

根据您的结论，排在前三位的一个是家庭美满和睦，一个是子女有出息，一个是与配偶关系亲密，您把它们放在前三位，是因为占的比重比较大吗？

**邱泽奇教授：**

是，得分高。我们是用得分来计量的，每个人，都会给分。

第一个，是同性恋的访题，我们看年龄分布，这里是有年龄分布的，老、中、青都有。我可以告诉你，年龄是怎么分组的，29岁

及以下算年轻的，中年是到 59 岁，60 岁以上是年长。我们可以看到年龄组之间的差异，越年轻越倾向于同意，总体上来讲，是不同意的，方差也很大，0.9，均值是 1.63，即便当 1，当 1.5，也只有 2.5，不够中间值，你说的是对的，越老越保守。不过，即使是年轻的一组，也不同意。

同学追问 7：

后边两个数加起来是 2.47，前面是 1.63，您说的是 10 到 29 岁，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根本没有自己的认识。

邱泽奇教授：

你低估了十几岁孩子对两性之间关系的认知。

同学追问 7：

老师，我有没有低估，您也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

邱泽奇教授：

我们直接问，这是直接问的。没关系，我们看到一个趋势，是越年轻越趋向于开放，不过，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把这两个加在一起，超过中间值的。没准再过几年，这个值变了。这是 2010 年的调查数据，请注意，我们是在讨论当时的数据，再过几年，会不会变，要看新的数据。

同学追问 7：

老师，我们换一种说法，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中国人对教育方式的看法，比如老一辈的人认为，该打就打嘛，几年级的孩子，家长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更多的年轻人认为，这种体罚的方式是不对的，这样得出的结论就是，大多认同该打就打这种教育方法。您能说大家对体罚的教育方式认同比较强烈吗？

邱泽奇教授：

这是两个问题，你讲的是算术平均值。我在讨论中用到的，是加权平均值。加权后的数据是概率代表性数据。如果是算术平均值，的确会受到群体规模差异的影响。比如说，你们这一代差不

多每年 2000 万，再往后，就只有 1600 万左右，差 400 万，这是存在规模差异的。规模差异对推论造成的影响，必须通过加权来解决。

孩子的观念的确会受到父母的影响。不过，在我们的推论中，青年组的年龄上限已经到了 29 岁。如果 29 岁还受父母的影响，数据也是实实在在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啊。

**同学提问 8：**

感谢邱老师，听邱老师讲课，非常幸福，包括问题和方法，还有结果，都讲得特别清楚。还有个事情，我要说一下，邱老师本人比海报上的图片帅多了。我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人为谁而奋斗，您的结论是为了家庭。在我出生后的二三十年里，一直有一句话，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可能那个阶段，我们是为社会而奋斗的吧，在费孝通先生文章的那个时代，还是为家庭而奋斗的，中间为什么经历了这么个过程，又回到了家庭，再后的就是进入个体化，中间是怎么进行这么个过程的？

**邱泽奇教授：**

非常好的问题。不是因为你说我本人比图片上帅，是说你敏锐地注意到了其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概念，这是个社会概念。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好，是因为，它提示我们，一个概念会不会融入人们的价值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真回顾“文革”期间的文献，我建议你们读一下阎云翔的《中国人的个体化》，阎老师就提到了“文革”这段时间，我这里是承接阎老师的讨论，讨论现状，就把那段给略过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建议看看那一段。

未来会怎么样，还真说不上，我刚说过，你们 90 后出生的这一拨人，会不会完全的个体化，真的很难说，如果大家还记得第一次现代性和第二次现代性，就应该还记得，至少有三个条件要满足。第一，个体的自主；第二，个体的自治；第三，个体的从众。这些

条件没有满足，就很难说个体化。不过，我们可以跳出来想一想，中国是不是一定要个体化，西方自己走出了一条路，我们会不会沿着那条路走，比如说我们的工业化，就没有像英国走了200年、300年，我们只走了30多年。

社会学家，在一定意义上，只看一个大趋势。这个趋势只是说，个体化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节奏有多快，会走向哪里，还要进一步观察，很难推算。

**同学提问9：**

老师，您好，我的问题没有很学术化，我很喜欢个体化这套东西，我很好奇，您研究这个是纯粹就学术上的一个趋势而言，还是就您个人而言，有什么看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我个人喜好来说，当然您证明了这个现状。我身边的人都很迷茫，说家庭已不足以支撑他们的奋斗了。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我非常支持个体化快点到来，我希望您作为一个长者，从代际关系考虑，您能告诉我们如何快点让它到来吗？

**邱泽奇教授：**

我先说最后一个问题，因为简单。我的回答是，我回答不了。

再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研究这个问题。我在做CFPS时，就在想，包括包老师，做社会学研究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弄清楚自己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在说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很多，中国社会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很好奇。

今天我们发现，中国人仍然很勤奋，中国还没有出现欧洲福利国家的懒汉，或至少比例还不大，这是我观察到的。至于是好还是坏，很难说。

问题是，勤奋就好？不一定。不过，这个现状，要告诉人们。

第二个，我们一辈子辛辛苦苦，到底为什么，很多人很迷茫。

比如说，我们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最后我们很清楚我们要上北大、上清华，最后却来到了民族大学，我们也觉得蛮好。刚才包老师讲，民族大学的社会学排到第六，非常好。问题是，读大学为了什么？作为育人的人，包老师告诉说，同学们，你们要为自己负责；包老师还会说，你们要对社会负责。

什么是社会？从哪里开始算是社会？我们知道从家庭开始，就算社会，至少我们知道大多数人怎么想，给你一个参照系，给你一个坐标，说对家庭负责，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状态，如果你对家庭负不了责，你对社会负得了责吗？大家还记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一个序列关系，一个人的能力，是一个嵌套着的能力，一个对家庭都无力负责的人，能对社会负什么责任？

你期望个体化快点到来，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到来，未必是好的事情，从价值判断出发，未必是好的事情。

社会学并不做价值判断，好还是坏；社会学告诉大家的是，个体化可能是大的趋势，你们要有准备，这是我们能做的事情。

#### 同学提问 10：

我想问一下老师，研究者在设计问题时，内心对问题会有一个倾向，就比如说，在家庭和和睦美满和子女有出息这个问题上，会不会在研究人员的内心深处，已经有对这几个问题的倾向的排序，他对数据的分析，会不会比较倾向于印证自己的排序？

#### 邱泽奇教授：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排序，这问题的排序是有讲究的，在调查中，一般排在前面的都是正面回答的问题，我们是有意这么排的，我们做过几次测试，第一，把 10 个问题随机排，很简单，做个随机数，一排就可以了；是否还有其他的排法？最后我们发现，不管怎么排，干扰不大，得到的结果，差异不大。

这就检验了刚刚同学说的，调查人员是不是有意去诱导受访对

象作答，的确是调查误差非常重要的来源。她提得很好。

王旭辉老师讲调查方法课，包老师讲调查方法课，都会讲到诱导提问。诱导提问，是调查实践的大忌。

在研究实践中，研究人员是价值中立的，目的是希望误差最小。  
谢谢！